

儲玉坤著

動盪中的中蘇關係

大公報代辦部總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動盪中的中蘇關係

實價五角

著作人

儲玉坤

發行人

戴有齡



總發行

大公報代辦部

漢口湖北街寶潤里
香港皇后道卅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自序

蘇聯能否幫助中國抗戰自衛？是要由兩個因素來決定的。一是國際環境，另是國共合作問題。關於前者，我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於三月十一日向蔣委員長報告中蘇關係，其結論曰：『蘇聯願以種種可能之助力給予中國以抗日本，惟無論如何，不願對日作戰。其所根據的理由：（一）蘇聯在國際關係中，處於孤立的地位；（二）不但英美不願予以保證，就是法國也勸告蘇聯，勿加入遠東戰爭。』（文匯報三月十二日）其實這一層，作者早已看到，曾在文匯報社論「中蘇關係的展望」一文中就說：『目前中日戰爭的重心，已有西移的趨勢。日軍在包頭結集重兵，西向進犯寧夏，究其企圖，無非欲截斷中蘇之陸路交通，使蘇聯欲助中國抗戰自衛，亦屬不可能。蓋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中蘇關係，日見密切，予日方以嚴重的威脅，在

日方向引以爲痛心疾首；然在中國民衆，深感蘇聯援助之迫切，而未見蘇聯之實力援助，對於中蘇關係之前途，亦多抱錯誤之見解。茲就現階段之中蘇關係，爲讀者解釋其前途光明也。

『中國共產黨駐蘇聯代表王明氏，於去年十二月，曾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涉及蘇聯援助中國抗戰問題，其言曰：「蘇聯人民對中國的抗戰自衛，表示極大同情，蘇聯在中日戰爭開始之後，與中國簽訂兩國互不侵犯條約，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精神上的慰藉；蘇聯與英、美、法等國家，一樣出售軍火與中國，給中國人民以物質上的援助。至於蘇聯出兵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中、日、蘇三國的問題，這是有關整個世界大勢的事件。」所以現階段的中蘇關係，蘇聯只能在精神上同情中國，物質上稍稍援助中國，至於蘇聯出兵遠東干涉中日戰爭，因限於國際環境，尚非其時。我們知道蘇聯的虛境，也有其困難所在。不但在東方有一個國家，揭起反蘇聯的旗幟，隨時準備進攻蘇聯，爲國際反共的急先鋒；而且在其西方，也有一個

同樣的國家，以反共爲藉口，企圖進攻蘇聯的烏克蘭。不僅如此，且在東西兩國之間，已有一種聯繫，這就是以此爲同盟烟幕的反共公約。所以蘇聯在事實上，有着兩個敵人，要同時對付，自然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問題。是以蘇聯一再申明其對中日戰爭的態度，就是蘇聯祇願在國聯的機構下，援助中國。例如今年一月底國聯行政院開會的時候，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日內瓦活動，一方面向各國倡議，主張國聯會員國以財政援助中國；另一方面又秘密向英外相艾登示意，如果英國能保證蘇聯西方邊境的安全，蘇聯可以全力來援助中國；換句話說，中國如能保證在蘇聯出兵遠東之後，德義不致趁火打劫，攻取蘇聯的烏克蘭，那末蘇聯便可以單獨援助中國，爲所欲爲。

『蘇聯內心的苦衷，我們十分了解；蘇聯外交的慎重將事，亦不無其理由的根據；例如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英外相艾登已辭職他去，張伯倫首相與新外相哈立法克斯一系的妥協外交，日見抬頭；英義談判，不日開始舉行，英國對義屈服，不

久就有事實表現，法國佛蘭亭也會對法蘇互助公約表示懷疑，而法國外交仍將追隨於英國之後。這些不可測的變化，都可以說國際環境正向着不利於蘇聯干涉中日戰爭的方面演變，所以蘇聯對中日戰爭，至今仍作壁上觀，未奉入戰爭的旋渦，我們不能說是蘇聯外交的消極；而該說蘇聯外交家的眼光遠到，認識清楚。這幾天的國際形勢，固然向着不利的方面演變，但是英義談判失敗之後，新的局面，又會出現於我們眼前。總之，歐洲的新局勢，尚在醞釀之中，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會有利於中蘇的時候。

『中蘇兩國間的困難問題，至今日為止，業已煥然冰釋。蘇聯革命成功後，曾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優林越飛相繼來華，向中國表示願為中國之友，幫助中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爭取民族解放的成功。可是加拉罕來華，雖成立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但由大體說來，中蘇談判是失敗的。及至中國國民黨出師北伐，蘇聯幫助中國革命，又因國共合作的分裂，而使中蘇邦交陷於困境，其後「九一八」發生，

中國深感外交的孤立無援，乃有中蘇復交的一幕，又因對共產黨問題的國策相左，中蘇合作未獲效果。這一段悲痛的歷史回憶，給我們無限的教訓。一則過去中國對於中蘇關係，認識不足，徒抱片面的綺麗幻想，以致中蘇關係，不能順利開展；二則現階級的中蘇關係，因國共的徹底合作，存於中蘇之間的阻礙，均已消滅於無形，今後的中蘇關係，祇要待國際局勢的變化了。而且我們相信這個國際因素，遲早終有實現的一天，未來遠東的局勢，將由中蘇兩國來奠定其和平的基礎。」（上海文匯報三月十日社論）

至於國共合作問題，不但在抗戰時期能密切合作，即戰後也能合作到底，作者對此問題，也曾在文匯報撰評，題為「國共合作之前途」，茲將原文抄錄如下：「自漢口新華日報遭暴徒搗毀以來，關於國共之間的謠言，日有所聞。茲就國共合作之基礎，闡明其光明之前途，以爲讀者釋念解憂。

『國共合作醞釀已久，至中國發動全面抗戰之後，始獲具體實現，由其合作之

過程言，其基礎之鞏固，決非普通政黨於政爭中暫時攜手合作之可比。蓋自九一八事件爆發，中國朝野無不認為國亡無日，深感「停止內戰立卽日抗」的迫切，於是國共合作之說，亦於此時開始萌芽矣。及至紅軍放棄瑞金，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至陝北重樹蘇區，國共合作又進入一新階段。其原因一則由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變本加厲，非至鯨吞整個中國不已；另則由於中國人民之覺悟，長此以往，把國力消耗於內戰，徒使敵人漁利稱快。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變」亦由此種政治背景而產生，而其結果，予遲遲未成的國共合作以空前的轉機，又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氏在西安與國民黨負責領袖晤談，取得了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共同原則，於是國共合作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而奠定其基礎矣。後來到了「八一三」展開全面的抗戰，接着蘇維埃政府的取消，以及紅軍的改編，次第實現，第八路軍更北開入晉，展開空前活躍的游擊戰，子日軍以致命的打擊，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統一團結共赴國難的宣言，正式表示共產黨信仰三民主義；蔣委員長亦發表重要談

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自此國共合作乃奠下鞏固的基礎。

『由此觀之，國共合作的基礎既完全建立在「抗日」的最高原則上，於今中國正處於長期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我們不但不相信，國共合作有破裂的可能，而且相信國共合作必隨中國抗戰的困難而益趨於堅固與密切。外界所傳種種，謂國共之間暗爭甚烈，顯然是奸人的陰謀，企圖破壞國共的合作，我們決不可輕信這種謠言。此其一。

『其次由其所爭論的問題言，不是抗戰時期的問題，而是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問題。在今日正處於長期抗戰的苦鬥中，最切實的問題，是如何延長抗戰的時期，如何增強抗戰的力量，以獲得最後的勝利。所以這些爭論即使有之，不是無聊文人的捉弄筆頭，就是奸人的從中播弄是非。此其二。

『最近中國共產黨重要人物屢次發表談話，均言及國共合作的前途，不但在目前抗戰的過程中合作，就是戰後建國的時期，亦必合作到底。於此更足以使我們相

信，此次中日戰爭，中國終必獲得最後勝利，而將以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出現於現世界之前。此其三。

「總之，國共合作的基礎，建立在「抗日救國」的最高原則上，在抗戰的過程中，國共兩黨精誠合作，共赴國難以制止日本的侵略，固不待言。就是在建國時期，共產黨既已一再表明信奉三民主義，由國共的合作，以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也是我們深信不疑的。「中國終將赤化」，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烟幕，早為明眼人所識破，無庸解釋的。」（見上海文匯報一月十七日社論）

由此可知中蘇關係的前途光明了。

最後關於本書的寫成，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就着手整理，至今年三月告終。作者於百忙中草成此書，錯誤難免，尚希讀者指示，以便在再版時更正。

作者誌於上海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動盪中的中蘇關係目錄

儲玉坤著

自序

第一章 革命期間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中蘇復交前的過渡狀態

一

第二節 反覆無常的外蒙獨立問題

一

第二章 中蘇復交的前後

第一節 中蘇復交的前奏——兩次對華宣言

二四

第二節 中蘇復交交涉的經過

二七

第三章 中蘇會議	七一
第一節 奉蘇協定的締訂	七一
第二節 日蘇協定的成立	八〇
第三節 中蘇會議的流產	八七
第四章 中蘇關係惡化	九四
第一節 由容共到清黨	九四
第二節 搜查北京蘇聯使館	一〇一
第三節 中蘇斷絕邦交	一〇八

第五章 中東路事件.....一一三

第一節 哈爾濱事件的發生.....一一三

第二節 中蘇衝突與國際調解.....一一三

第三節 伯力草約與中蘇交涉.....一三四

第六章 中蘇邦交的恢復.....一四三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與中蘇復交.....一四三

第二節 中蘇復交的進行.....一四六

第七章 蘇蒙互助協定與中蘇交涉.....一五一

第一節 蘇蒙互助協定的內容.....一五一

第二節 中國的態度 一五七

第八章 中蘇關係的展望 一六五

第一節 國共合作的波折 一六六

第二節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 一七六

第三節 蘇聯能幫助中國嗎 一八九

動盪中的中蘇關係

第一章 革命期間的中蘇關係

第一節 中蘇復交前的過渡狀態

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在歐洲大戰的烽火中，俄國燃燒起了「三月革命」的野火。

沙皇便被迫宣告退位，而由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出來組織臨時政府。此時，俄國在內政上雖有政局的演變；但是在外交上仍舊遵行倫敦協定，繼續與同盟各國作戰，所以俄國的對外關係並未引起劇烈變化；而且臨時政府也曾獲得中國的承認。（註一）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七日在列寧 (Nicholas Lenin) 領導下的社會革命成功，樹立蘇維埃政體 (Soviet regime) 後，不但在內政上起了劇烈的變動，而且

在外交上且主張與同盟國單獨媾和。十一月十五日便簽訂了休戰條約，明年三月蘇德舉行和平會議，簽訂倍雷力托斯克條約(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自此蘇聯就正式退出了戰團。無疑的，蘇聯的那種行動，激動了歐美各國；因此蘇聯的對外關係，便發生了空前的劇變。自從一九一八年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在這兩年之中，蘇聯與協約各國之間的正式關係，一直陷於中斷的狀態下。同時在蘇聯方面，共產黨完全在列寧、托洛斯基(Leon Trotsky)、齊諾維夫(M. Zinoviev)加孟涅夫(M. Kamenev)、來可夫(M. Rykov)蒲哈林(M. Bukharin)(註1)等的世界革命的理論的支配之下，積極煽動世界革命。一方面組織第三國際，另方面資助他國的共產黨，企圖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因此惹起列強的恐慌與忿恨，於是一面援助反動的白俄在蘇聯境內搗亂，另方面實行出兵西伯利亞、高加索；並實行對蘇聯經濟封鎖。

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對立尖銳化的情況之下，無疑的，貧弱的中國

也聽有英、美、日、法的馬首是瞻。所以對於蘇維埃政府，北京政府一直未予承認；而中蘇關係，也就陷於不正常的狀態下。舊俄政府駐華公使庫達攝福（Prince Kondachev），依然繼續行使職權；而中國政府也承認他可以暫時代表俄人在華的利益，保護在華的俄人。（註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協約國及參戰各國，允許中國對於庚子賠款，暫緩償還五年，他也會代表俄國參與其事。（註四）中國政府不但不承認蘇聯，而且在暗中援助白俄活動，俄國的租借幾為白俄活動的大本營。當時中國，在日英帝國主義者的挾持之下，也成了反蘇聯合戰線中的重要的一環。可是中蘇間的普通關係，依然不絕如縷，各項交涉仍在非正式的外交關係下進行：例如中東路及其區域的交涉。

中東路是在一九〇三年完成的，而「庚子事變」發生的時候，俄國已乘機出兵佔領了東三省，奪取了中東路的守備權。單單駐紮在哈爾濱，就有三萬左右，至歐洲大戰爆發後，便紛紛調回到歐洲的戰場上去，在中東路只留下極小一部分；但是